

林其銓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五緣文化論

顧廷龍題



WUYUAN WENHUALUN

林其燊著

五缘文化论

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
“五缘”文化与经济研究室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4

(沪) 新登字 119 号

责任编辑 俞子林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五缘文化论

林其铤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上海浦东通用科技开发公司排版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字数 140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ISBN 7-80569-949-6/G·61

定价: 7.00 元

序

朱荣林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其内涵有着极其深刻的哲学背景。它既源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又对历史的演化和社会的进步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综观当今世界三大最活跃的资本——华人资本、阿拉伯资本和犹太资本的形成过程，都可以追溯到他们的文化渊源。

世界上每一种文化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的产物，它正确地反映了一个民族所处环境的社会结构和价值取向。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古文明的农业大国，其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农”的印记，因而是一种典型的农业文明。由于农业生产的特点，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无法搬走，作物生长靠天，收获期较长，因此必然对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提出一定的要求。基此，从事这种经济活动的人们自然需要世代与土地相伴，生活在一起。一种严格而稳定的家族制度也就相沿成习。而作为农业文明反映的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儒两家，正是符合历代农民的需求：道家赞美自然，力主返朴归真，宣扬无为而治；儒家则推崇伦理纲常、仁义礼智信，宣扬礼义治国。因而，中国的文化，也可称之为“道德”文化。

农业文明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其发展速度的缓慢，决定了这种文明的稳定性。由于中国文化的基石是农业文明，因而其基本构架也是极其稳定的。这种稳定性，足以解释中国

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为何在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过程中只有出现“化西”,而从未发生过“西化”现象的缘由。那么,中国文化这种稳定构架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这就是本书作者林其铨教授经过长期潜心研究后提出的一个为华人世界所共鸣的学术观点。

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在应付变幻多端的环境挑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既需要个体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更需要群体的协同力量。世界华族之所以能在全球五大洲、近 150 个国家和地区立足,并结合成为一个庞大而有序的整体,其基本原因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起作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语)。而进一步剖析这种核心价值观的成因,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以群体为本位,以家庭为中心,人际关系重伦理,心理风习重情谊。与这一文化特征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中心,由小及大,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延伸拓展形成社会人际网络。对于这个网络的背景文化,林其铨教授称之为“五缘”文化:亲缘——宗族亲戚关系;地缘——邻里乡党关系;神缘——宗教信仰关系;业缘——同业同学关系;物缘——以物为媒介的人际关系。

“五缘”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群体本位、伦理中心主义的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其强大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起调谐内部和整合社会的功能。因此,它起到了几个世纪以来凝聚华族力量和沟通华族渠道的决定性作用。其主要表现有以下方面:

一是“五缘”文化的渗透力。“五缘”文化在华人面前,没有国界和意识形态的人为阻隔,它能穿越政治和非关税壁垒的界限。二次大战后,尽管 80% 的华族移民加入了所在国国籍,华人资本也日趋国际化、现代化,但世界范围的华族联系非但没有削弱,反而走向国际化和经济化。据统计,1946 年全球华人组织共计 3975 个,1980 年已经增至 8619 个,增加了 217%。进入 80 年代后,海外华人社团组织发展势头更快。仅 1988 年和 1989 年两年间,海外华人社会就有 10 多个国际性的“五缘”性组织先后成立,并举行了世界

大会。其中1991年8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有30个国家和地区、70个城市、800名华商代表与会。

二是“五缘”文化的凝聚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五缘”文化对中华民族的个性、文化心理特征、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具有深刻的影响。这一深刻影响作为一种强大的人际凝聚力，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散居海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万炎黄子孙，使他们在已经改变国籍的境况下，仍然维系着自己的生活圈子，保持来自祖国的风俗习性和生活方式。这种习性和方式再一次证明了，海外华人历尽沧桑和变故，其文化认同准绳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准。“五缘”文化凝聚力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三是“五缘”文化的相容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经过数千年南北文化的撞击、融合，在兼收并蓄多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形态的“五缘”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传播区域的扩大，既有其传承的一面，又有其变异的一面，而这种变异正是传承和发展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这种意义说，没有变异，也就没有真正意义的传承，更谈不上发展。而“五缘”文化这种变异现象，既不会使其基本特征泯灭，又从另一个层面证明了它的相容力。凡是具有兼收并蓄的相容力的文化，必定是极富生命力的、极其稳定的文化。正是这一文化的相容力，才使得海外华人身居世界各地，在孤立无援的环境下，能汲取西方文明，溶入外来文化，丰富充实自己，并立于不败之地。以华族为主体的新加坡，就是把华人的“情、理、法”传统观念，适时改变为“法、理、情”的一个成功范例。

“五缘”文化既可以解释散居五大洲华人社会的许多独特现象，又能成为沟通华人世界的纽带和桥梁。因此，这一文化理论为世人所关注，是不足为奇的。未来21世纪是亚洲世纪，当前又处于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时空的优势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应当充

分应用“五缘”文化这一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无形资产，审时度势，抓住历史机遇，去迎接新纪元的挑战。

“五缘”文化可以作为发展海峡两岸关系，进而实现祖国统一的桥梁。台湾学者曾经激动地告诉过林其燊教授，统一祖国大业是两岸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五缘”文化是双方均能接受的文化，是海峡两岸统一大桥的五个“桥墩”。由于“五缘”文化的强大渗透力，可以作为长期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下的海峡两岸人民感情沟通的渠道。从这种意义上讲，“五缘”文化不仅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重要桥梁，而且也是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之后，在“一国两制”的国度里互相沟通的重要纽带。

“五缘”文化还可以作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区域化、集团化、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朗的态势下，我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武器。举世瞩目的亚洲，即将成为 21 世纪的经济中心，这几乎是各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的共识。中国处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中心，其地位可想而知。其有利一面而言，亚太地区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各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发展极不平衡，从而构成了多元性，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各国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其不利一面，是面临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而出现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非关税壁垒的重大压力。强大的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新近美国国会正式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所产生的影响，即将波及亚太地区。而据有关国际经济理论研究显示，大小市场之间相互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则受益方将是大市场一方。因此，加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是对付全球经济区域化、集团化和一体化的一剂良方。而海外华人 90% 集中在亚太区域，其资本是加强亚太地区各国和各地区经济合作的催化剂和粘合剂。据亚洲发展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统计数字，1992 年仅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三个中国人地区和华族为主体的国家，外汇储备总额已高达 1506.8 亿美元。天然的“五缘”网络，成了海外华

人资本跨国界和区界进行广泛经济合作的得天独厚条件。

由于经济驱动力和文化凝聚力的交互作用,这种经济合作将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即以共同的利益为基础,以共同的文化为纽带,逐步形成“华人经济网络”和“西太平洋成长子午线”。在这样的经济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决定了自己肩负的重大使命。而这一使命的实现,必将为“五缘”文化理论提供极其广阔的活动天地。这就是《“五缘”文化论》一书为何选择在这样的时机问世的动因。但愿她生逢良时,不负众望!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于上海

前 言

以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为内涵的“五缘”文化研究，酝酿于 80 年代中期，正式提出是在 80 年代后期，首次见之文字的是笔者在 1989 年撰写的《“五缘”文化与纪念吴本》和《“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前者是为由海峡两岸学者参加的，于 1989 年 4 月 17 日至 20 日在福建省漳州市召开的“纪念吴本诞辰一〇一〇周年学术讨论会”而撰写的论文；后者是应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第一届全国侨务工作研究论文评选征文而作。前一篇论文首次公开发表在《上海道教》1989 年 3—4 期合刊；后一篇最先刊载于《亚太研究》1990 年第一期。

激发笔者对“五缘”文化的兴趣并转而立题研究的动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福建经济蓬勃地发展；一是对华侨、华人经济思想研究和管理科学化、民族化问题的思考。80 年代初、中期，笔者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思想史研究室从事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管理思想的研究工作，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发现：我国企业管理在 1949 年之后，从强调“一边倒”照抄照搬苏联管理模式，到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闭关锁国盲目排斥外来经验，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管理模式，再到一度被人们称之为“摇头风扇”式地盲目模仿西方管理模式。对这些模式且不作历史评价，但从实际的效果看，可以说都未能获得真正的成功。正是这一考察，促使笔者转向管理的科学化与民族化问题的思考，也就是科学管理的基本原

则与运行机制文化环境相互关系的思考。这一思考,必然地涉及到东西方文化本位、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基因、社会伦理、人际网络等诸多问题,由此也发表了多篇论文。^①在此期间,有一个更为直接的动因是:笔者参加了由马伯煌教授主持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编撰,并且具体负责“戊戌变法”时期即“资产阶级改良思潮的形成及其经济思想的前进与后退”这一篇的研究与撰写。在这一课题研究中,涉及到海外华侨资产阶级独特的形成道路和运营模式的探索,因而更扩而大至近代海外移民的特点、华侨华人社会网络同经济贸易网络之间的联系等问题。特别是笔者在广东、福建侨乡进行课题调查过程时,正逢上东南沿海在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指引下,自觉或不自觉地广泛运用“五缘”社会网络,大量引进海外华人资本,促使地方经济蓬勃发展。这就启迪了笔者把经济同文化、历史同现实、中国本土同海外华人社会结合起来加以探研的思路。1988年底到1989年初,上海社会科学院根据亚太地区发展和国外区域研究发展趋势,决定筹建以亚太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综合研究为基本任务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笔者被调入该所从事华人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工作。在过去酝酿的基础上,提出了《“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人投资》研究课题,并被批准列入上海社会科学院1990~1991年科研规划重点。尔后随着研究的展开,又有了《“五缘”文化与对外开放》等课题的建立,而且被列入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八五”规划重点项目。这本《“五缘”文化论》,就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成果。

“五缘”文化研究,基本是以华族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为对象,涉及的范围主要有:华族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的历史嬗变;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与伦理思想的传承与变异;华族社会“五缘”性社会团体组织的形成、演变以及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状况和发展趋势;“五缘”文化对华人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特别是“五缘”社会网络对华商运营网络以及管理模式形成的影响和作用;在

世界经济国际化、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双重发展导向中，“五缘”文化对国际华人资本运营和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影响与作用等。基于“五缘”文化所涉及的广泛范围，它具有跨越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边沿特点。

“五缘”文化的提出和展开，一开始就得到海内外师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著名的文化界前辈张光年、王元化，对笔者的研究一开始就给予热情的支持和鼓励。在1989年于福建漳州召开的“纪念吴本诞辰一〇一〇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当笔者抱着试探的心情首次以论文的形式提出“五缘”文化说的时候，便得到海峡两岸学者的首肯，甚至热情地将其喻为是“凌架海峡两岸桥梁的五座桥墩”，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和鞭策。后来，随着研究成果的陆续刊布，国务院侨办、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都先后给“五缘”文化的研究成果以肯定、奖励；《新华文摘》、香港《大公报》等许多海内外报刊也给予转载、评述，这也大大增强了笔者深入研究的信心和力量。在近几年，笔者先后多次在许多省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市进行与“五缘”文化有关的课题调查，得到了很多有关部门和人士的热情支持和帮助。为了掌握海外华人社会的第一手材料，1992年应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的邀请，到海外华族最为集中的新加坡作了一个多月的访问和考察，在那里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包括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福州会馆等在内的众多民间团体和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和有力帮助，从而获得了大量有关海外华人社会的资料，这是笔者永远难以忘怀的。因此，有充分理由说：“五缘”文化说的提出和研究的展开，实乃社会之功，是聚集了大家智慧的结果。

自从“五缘”文化说公诸于世之后，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现在有“五缘”说、“十缘”说、“八缘”说、“三缘”说；在赞同“五缘”说的当中，对“五缘”内涵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有的认为应该以“血缘”代“亲缘”（按：“亲缘”含血亲、姻亲甚至还应

包括“假亲”);有的主张以“善缘”代“神缘”;“史缘”代“物缘”;“文缘”代“业缘”。笔者认为:开展讨论对于学术是好事,只有通过各抒己见的讨论、多方面的切磋,研究方能深入;只有集中大家的智慧,学术才能臻于完善。“五缘”文化的研究还在开拓阶段,涉及和未涉及的问题甚多,只有群策群力,才能不断提高和发展。但愿《“五缘”文化论》的出版,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以深入。

本书汇集了笔者自 1989 年以来在全国各报刊发表的十二篇论文(其中《“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人投资》原是一篇较长的研究报告,部分章节已经发表,收入本书的几节未曾公开发表过),和两篇附录。文章基本维持原貌,但由于“五缘”文化研究在初创阶段人们对其基本概念比较陌生,所以几乎每篇论文都得花一定的篇幅加以阐述,这样有些文字和资料也就难免重复。作为单篇文章发表,问题还不大。如果汇集成册,那就会令人感到繁复了。为了不使读者繁累,在编辑此书时,除个别文章外,尽力予以删节了。不过尽管如此,由于文章原来的框架,因而少数地方仍难完全避免,这里只有请读者宽谅了。“附录”之一是由《“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节写而成改题为《“五缘”文化与亚洲的未来》,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 年第 2 期上,后被《新华文摘》1992 年第 9 期转载,又被译成英文收入《SASS PAPERS(4)》中,将其作为“附录”收入,目的是在便于同不谙中文的国外学者进行交流。至于“附录二”,则是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五缘”文化研究的背景。

《“五缘”文化论》的编辑与出版得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上海分所的支持和帮助。这个研究所是从事国际经济技术和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学术研究,跟踪、预测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动向,为国家和上海科技经济发展的决策提供参考信息和意见的研究机构。所长朱荣林教授有鉴于 21 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地位,以及中国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海外华侨

华人的重要作用,不仅决定建立一个“五缘”文化与华人经济的专门研究机构,而且全力支持编辑出版《“五缘”文化论》,为的是扩大对外学术交流,推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笔者对朱荣林教授的卓识远见深为敬佩,对他的热情支持并为本书作序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五缘”文化论》出版之际,著名的文化学学者王元化教授,为本书作了题辞;年逾九旬、德高望重的版本学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教授为本书题了签,这使本书增辉不少,在此谨向两位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上海书店曾先后出版笔者的多种著述,总编辑俞子林和副经理林国华等先生对此书的出版又给予大力的支持,在这里也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的出版,得到上海浦东通用科技开发公司的热心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还得到吴必发、李科达等诸多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在这里向他们,同时也向在“五缘”文化研究工作中所有给予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五缘”文化研究还处在开拓阶段,许多方面还很很不成熟,加之笔者识见不广、水平有限,舛谬之处实难避免,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林其锁

一九九四年元旦于沪上透风漏月室

注: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请参阅拙作:

- (1)《关于现代化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的思考》,见《管理思想探源——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新华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
- (2)《人性、义利与现代化管理》,见《历史与企业家的对话》,改革出版社1992年7月出版。
- (3)《科学化、民族化、民主化——九十年代企业管理发展趋势》,见《九十年代企业改革与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目 录

序	朱荣林 (1)
前 言	(1)
“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	(1)
“五缘”文化与纪念吴本	(25)
“五缘”文化的传承与变异——论妈祖文化现象	(31)
论“神缘”文化研究与改革开放	(40)
论“五缘”文化在对外开放发展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	(46)
“五缘”文化——对外开放的五色桥	(54)
“五缘”文化与通俗文学	(67)
“五缘”文化与海外华人投资	(71)
论文化认同与华人社会	(88)
孙中山“建设一大中华民族”的理想与廿一世纪	
华族的团结和联合	(103)
海外华人创业文化	(117)
儒家思想与东亚现代化道路	(123)
追求和谐：人—社会—自然	
——东西方人天观比较与人类社会现代化	
道路的选择	(133)
附录：	
The Culture of Five Relationships and the Future	
of Asia	(143)
李科达：林其铨和“五缘”文化	
——林其铨访谈录	(166)

“五缘”文化与未来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外(除中国大陆和台湾)华人(包括仍持中国护照的华侨和已取得外国国籍的华人及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人数激增。据有关统计资料,1948年为8,721,000余人,到1984年已增至27,887,533人。36年增加近330%。^①若依此年平均增长率推算,迄今已超过3,000万人。^②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东南亚独立国家的出现、1955年我国放弃血统主义国籍法,因而约90%的华侨取得侨居国国籍,渐由“落叶归根”的华侨向“落地生根”的华族转变。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起飞,华人资本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一切都说明:海外华人社会已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21世纪的到来,世界华人在全球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中,将呈如何发展的趋势?它同我国“四化”建设将有怎样的关系?我们的立足点与对策是什么?这都是需要作全面而又深入研究的。本文的目的只是想从文化与经济相互推动的角度,对华人社会在未来发展中的若干趋势和我们的对策作一初步探索。

一、“五缘”文化与华人社会

全世界的华人不论其国籍如何都是炎黄子孙,都属于中华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习惯心理,以及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把海外华侨、华人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世界上每一种文化的产生,都有其一定的背景。背景不同,所产生的文化类型也都

不同。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 1917 年出版的《西方的衰落》一书中，从文化形态史观的角度提出了 8 种类型的文化：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和西欧文化。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由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基本特征，即被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称之为文化核心。中国文化由于它产生的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有自己的特点。如果以中国文化与西欧文化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两者的本位和价值取向迥然相异：西欧文化以个体为本位，奉行的是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人权、人格、独立和自由，人际关系主要靠契约来维持，所以有人称西方社会是“契约社会”；中国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以家为中心，强调的是家、族、宗、国，人际关系重伦理，所以有人说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在结构上最大的特点便是伦理中心主义。这种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构架，以家庭为中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延伸扩展，形成社会关系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用“五缘”加以概括。所谓“五缘”就是亲缘、地缘、神缘、业缘和物缘。所谓亲缘，就是宗族亲戚关系。亲缘有血亲和姻亲之别，包含父族、母族和妻族，儒家经典《中庸》中的“五伦”关系，“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便是这个关系的核心。由于中国社会长期为父系社会，所以从这个核心扩而展之，便形成了以姓氏为标志结合起来的同父共祖的人群，其组织形式便是家庭、宗祠、宗亲会等等。所谓地缘，就是邻里乡党关系。古之乡遂遗规有所谓比、闾、族、党、州、乡、邻、里、鄹、鄙、县、遂等等；现代则以籍贯认同的小同乡和大同乡，其常见的组织形式便是各种同乡会馆。所谓神缘，就是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共奉之神祇为标帜进行结合的人群，其组织形式便是神社、教会等等。所谓业缘，就是以同业和同学而组合的人群，如各种商会、同业公会、协会、学会、研究会等等。所谓物缘，则以物（如土、特、名、优）为媒介而发生关系并集合起来的人群，如以物为对象而成

立的行会、研究会之类的组织。“五缘”关系有别又相连，单个的家庭组成家族，聚族而居组成村社，血缘关系也就发展为地缘关系。古代有“胙之土而命之氏”的说法，说明亲缘与地缘之不可分。社有社神，“后土为社”，因而社还是信仰的中心和社会团体，所以又与神缘相关。在许多场合，“五缘”关系是难以截然分割的。海外华人基于共同的利害关系，发扬物以类聚的精神，联络感情，有事守望相助，“五缘”网络形成了华人社会坚强的基石。）

中华民族以伦理为中心，以“五缘”为形式的文化，其突出的功能便是起调谐安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人类社会要生存发展，既要有个体的创造活力，又要有群体的协同效应，特别是在生产力还尚未获得充分发展的时候，群体协同效应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由于这一地域纬度较高，气候严寒，雨量稀少，黄河经常泛滥成灾，加之游牧民族经常骚扰和侵入，因而需要对付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各种生活的横逆和挑战，这种背景使得中华文化形成重人文、重伦理的特点。因为在严酷的环境（包括自然与社会）挑战面前，唯有依靠自身的团结与互助，才有力量应付和战胜。关于这一点，印度尼西亚研究华人社会的学者西斯沃诺·尤多·胡梭多，在他的专著《新公民》中指出：要期望华人在原种族集团以外同其他种族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极其困难的。之所以如此，同数千年来华人的祖国经历的各种严重的考验和遭遇的各种灾难（无休止的水灾、饥荒和瘟疫）密切相关。在环境的各种严重挑战面前，弱者必败，惟有强者胜，而最亲近的莫过于自己的家庭和亲属。^⑧的确如此，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当社会动乱之际，人们为了求生存，或聚族筑坞堡以自卫，或举家举族而迁徙。这种情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晚唐五代以及近代都表现得非常突出。陶渊明《桃花源记》：“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当时由于北方战乱频繁，举族南迁者甚众，因此遂有王导制